

太平天国

诗文选译

● 杨益茂 宋桂芝 ●



巴蜀書社



太平天国
诗文选译

卷之三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太平天国诗文选译

杨益茂 宋桂芝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周道贵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太平天国诗文选译

杨益茂 宋桂芝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敏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致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指引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家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在中国近代浩瀚的诗文中，太平天国诗文是一枝独特的奇葩。它产生的环境、宣扬的内容、表达的情感、追求的志向，都是同时代乃至历代诗文不能取代的。

太平天国诗文首先是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产物，是对这场农民革命狂飚的真实记录和农民革命感情的抒发。它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革命的参加者和指挥者。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天王洪秀全、南王冯云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成为太平天国诗文创作的主将。他们的诗文，就是对自身革命斗争实践的再现与升华。

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洪流中一曲极其雄浑、悲壮的乐章。自 1850 年“金田起义”起，至 1864 年“天京”（太平天国首都，今南京）陷落止，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其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等的领导下，高举革命旗帜，同封建统治阶级及外国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凭着大刀、长矛与装备精良的敌人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打垮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使农民革命洪流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终于在 1853 年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为了求得生存、发展和胜利，长途跋涉、艰苦备尝，先后转战 18 省，占据 600 多座城池，不仅使革命狂飚席卷南中国，而且极大鼓舞了各地各民族人民的斗争，形成了振荡全国的起义风暴。太平军所到之处，击溃乃至消灭清政府的反动军队，摧毁地方反动政权，打击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烧毁田契债券，使饱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得以扬眉吐气。他们“食未尝之食，衣未见之衣，……以为不世奇遇”（张德坚：《贼情汇纂》），衷心欢迎、拥护这一革命，欢庆这一胜利。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不仅敢于破坏旧世界，而且倾注全部智慧描绘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着手创建“人间天堂”式的新世界。奠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就提出了著名的农民土地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这份文献中，他们从小生产者的地位出发，用丰富的想象力，美好的语言，描绘了一副令人神往的理想蓝图，力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社会。在这幅蓝图中，他们把历代农民迫切要求平分土地和一切社会财产，渴望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以往农民革命提出的“均贫富”、“均田”等简单、笼统的口号，作了具体、明确、系统的规划和设想。《天朝田亩制度》使太平天国成为我国有史以来农民战争最高峰的显著标志。

然而，在世界逐步转向资本主义的潮流中，这幅改造社会的蓝图是难以实现的。太平天国又在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广泛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逐步建立起适应

社会需要的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战争。常熟《报恩牌坊碑序》中记述的“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的状况和“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的热闹场景，形象地描绘了太平天国统治区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体现了太平天国社会政策的实际效果。

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太平天国后期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了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并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首肯。《资政新篇》以敏锐的触觉感受到世界发展的脉搏，试图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太平天国环境中移植资本主义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创办工矿企业、交通、邮电，兴办学校、医院，奖励发明创造，发展社会福利，乃至效仿西方兴办报纸、设立暗柜（意见箱），以增加民主色彩。《资政新篇》展示了社会发展方向，描绘了中国的希望，起了引导农民走出狭隘天地的作用。诚然，在这份方案中，仍夹杂着封建主义的糟粕和不切实际的成分，但已比平均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高明不知凡几，它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对社会发展认识的最高水平。

太平天国对未来社会的探索与实践，正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轨的产物和缩影。它产生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渗透、交融的早期，诞生于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广大农民群体之中，从而使这场革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近代气息。

毋庸讳言，太平天国终究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革命；农民终究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走出封建

巢臼，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相反，却在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的交相侵蚀下，逐步滑下封建化的泥潭，一步步削弱了自身的革命力量。1864年7月19日，反革命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最终在封建势力与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失败中陷于灭亡的绝不是革命。尽管太平天国未曾实现“处处平匀，人人饱暖”（《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也没能推行《资政新篇》式的改革，甚至没有取得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胜利，然而，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纯朴农民，毅然不顾抄家灭族的危险，拿起刀枪与穷凶极恶的清朝反动军队和外国侵略者浴血奋战达十余年之久，谱写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壮丽篇章。他们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对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乃至陈腐的礼教、习俗进行了空前扫荡，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和勇敢的实践，力图建立大异于清朝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雄辩地证明，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酷爱自由、抵御外侮、反抗暴政的优良传统，而且展示了学习先进、勇于变革的革命精神和向往、追求美好生活的热切愿望。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虽然不可能使他们达到理想的彼岸，但事实证明，他们是先进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最有力的同盟者和生力军；他们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革命精神，继续鼓舞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景仰太平天国并理所当然地予以永远的纪念。译、注太平天国诗文正是这种心愿的一种表现。

太平天国诗文是太平天国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献。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在农民革命史上没有先例。这主要归功于太平天

国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长期的、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领袖人物不仅自己动手书写了大量诗文，而且动员、组织不少忠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从事创作、编纂工作。他们在天京专门设立镌刻衙、刷书衙，在军队中组建镌刻营等机构，大量刊刻、印行诗文，使之广泛流传，乃至船载、车运，形成“汗牛充栋，人人习见”（张德坚：《贼情汇纂》）的局面。其品种，大体可分为官方文件（如诏旨、本章、文告等）、个人诗歌、专论、自述（回忆录）等多种。内容涉及宗教、政治、规章制度、军事活动、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太平天国历史等诸多方面。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诗文，构成了太平天国文化的百花园。

然而，这座近代文化史上奇异的百花园，却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遭到了浩劫，几乎被中外反动势力焚毁一空。只有少数作品历经劫难，得以保存在民间，流传到海外。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和民主革命的高涨，太平天国文献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收藏在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的太平天国诗文相继被我国学者发现，陆续抄录、影印回国；与此同时，国内民间收藏的诗文也得以相继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平天国诗文得到广泛的搜集、整理、刊行。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几乎灭绝的太平天国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这些经过炼狱的诗文，显然更加重了自身的价值。

太平天国诗文是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杰作，记叙的是太平天国浴血奋战、艰辛发展的真实历史；反映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抗争、奋斗、探索的心声。在太平天国诗文中，尽管对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本质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本能地感受

到反动压迫、剥削的切肤之痛，对反动统治的腐败、黑暗和虚伪予以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予以严正警告和坚决回击。太平天国还以大量诗文向人们展示了试图建立人间天堂的热切愿望，它的种种描述往往令人心驰神往，赞叹不已。但是，精美的构筑形式后面掩盖的却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本质，是一朵结不出硕果的鲜花。应当指出的是，平均终归是对不平的不满与否定，因此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平均主义自然是农民反抗剥削、压迫，要求改变贫富悬殊状况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它在冲击封建制度方面的合理性、正义性不可抹杀。此外，太平天国文献中提出的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种种设想，无疑也是对封建主义最具现实的否定，从而预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构成了太平天国诗文的主旋律。

太平天国诗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世纪是宗教神学泛滥的时代。没有先进的阶级力量和科学思想指导下的农民，既不能理解自然界风雨雷电的起因，也不理解人世间贫富贵贱的根源，他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一切。因此，他们往往将自己的情感诉诸宗教，用宗教发泄不平与怨恨，诅咒吃人的制度与恶魔，寄托与憧憬美好的未来。不过太平天国宗教与以往农民宗教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来源于西方的基督教，并用农民的革命精神和中国宗教的某些形式将其改造为适应革命斗争，易为中国大众所接受的“拜上帝教”。太平天国诗文充满了宗教语言。今天，我们在阅读这些诗文时，应当能够透过宗教的外衣，看清它所揭示的革命内涵：拜上帝教所崇尚的上帝，实际上是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的复仇之神；它仅仅在革命队伍内部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对革命对象诉诸暴力；它不要人们安

于现状和命运，而要人们拿起刀枪杀尽阎罗妖——即地主、恶霸、贪官污吏及他们的总代表清朝皇帝，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它不是要人们靠忍受屈辱“赎罪”来换取灵魂进入天堂的门票，而要靠斗争、探索来建立人间天堂。太平天国诗文用宗教语言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改变现实生活的愿望，起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巨大作用。然而，宗教毕竟是颠倒的世界观，经不起现实斗争的考验。当太平天国不能科学地解释挫折和失败，不能将神话变为现实，不能满足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时，神话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乃至成为麻醉自我的祸害。

太平天国诗文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两千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展开了挑战。儒学作为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太平天国初期的诗文，为了论证其事业的正义性、合理性，也为了避免宣扬拜上帝引来的“从番”之嫌，一度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但是，随着革命力量的扩大和农民政权的建立，太平天国一度试图罢黜儒家以至诸子百家，宣布禁止买卖、收藏、阅读孔孟及诸子百家书籍，将其“尽行焚除”，对已刊行的太平天国诗文中引述的儒学原文，或加以删除，或进行改写，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第一次打倒孔子偶像、否定儒家绝对权威的可贵尝试。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次极其大胆的举动，不仅有利于推动当时革命斗争，而且势必对后人产生重要的启迪。然而，太平天国既然不能摧毁封建社会，自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它的上层建筑。儒家的政治主张和伦理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太平天国专制政体的需要。因此，太平天国很快又对儒家思想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太平天国公开宣称“孔孟非妖书”（佚名：《金陵纪事》），但要将

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张德坚：《贼情汇纂》），后来，又进一步说：“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洪秀全曾率先动手删改《诗经》，又在天京设立专门机构——删书衙主持其事。删除的具体情况，据说：“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原书称“上帝”的地方，都要在“上帝上加皇字”。“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等。可见，删除的主要是不符合拜上帝教的鬼神迷信及违背太平天国制度的文字，其它则作为“真话”、“正话”予以保留。太平天国诗文的这种状况，体现了对儒家思想既敢于批判又大量沿用的文化特点。

太平天国诗文在文字风格方面显示了通俗、质朴的特征。诗文大都采用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文体写成，粗犷、憨直，感情真挚，容易为群众接受。其中如《太平天日》记述洪秀全灵魂升天，接受天父上主皇上帝的教导，怒斥孔丘，战胜妖魔的诸多神话及返回人间发展拜上帝会，密谋发动起义的经过，写得飘逸自然，绘声绘色，富有感染力。洪仁玕的《钦定英杰归真》，采取回答一位投诚者种种疑难的形式，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礼仪称谓、生活习俗等一系列问题由浅入深，反复辩难，语言生动活泼，朴实清新，阐述、宣传了太平天国的主张。

值得称许的是，太平天国还用政权的力量专门对文风进行了整顿。他们认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钦定士阶条例》）。“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将